

〈關於月氏問題〉導讀

徐文堪^{*}

月氏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族。關於這個部族的起源、歷史和語言，近百年來世界各國學者進行了反復的論辯，至今尚未取得比較一致的結論。

月氏問題與另一個學術難題「吐火羅問題」有緊密聯繫。1892 年，俄國印度學家奧登堡（S. F. Oldenburg, 1863-1934）首先發表了在新疆發現的一種未知語言的寫本殘頁。怎樣稱呼和解讀這種語言，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焦點。根據回鶻語本《彌勒會見記》（*Maitrisimit nom bitig*）的題記，解讀西域文書的大家、德國學者繆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在 1907 年將該語言定名為吐火羅語（Tocharisch）。這種語言的主要解讀者西格（Emil Sieg, 1866-1951）和西格林（Wilhelm Siegling, 1880-1946）贊同繆勒的命名，並清楚地證明了這種語言是印歐語系中獨立的一支。

吐火羅語可以分為 A、B 兩種，過去常被稱為「方言」，經過多年研究，已證實這兩種「方言」的差別相當大，實際上應該視為兩種彼此相近的語言。「吐火羅語」這一名稱雖已衆所周知，不過根據近幾十年的發現和研究，就吐火羅斯坦其地而言，公元 1

^{*}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至 9 世紀間除佛教徒使用的諸印度語外，主流語言應是巴克特里亞語（Bactrian，大夏語），屬伊朗語。¹那麼，許多中外史籍都有記載的類似「吐火羅」這樣的名稱究何所指，就成了一個頭緒紛繁的不解之謎。

根據《史記》等書的記載，月氏始居於今天甘肅西部到新疆東部一帶。匈奴一度臣服於月氏。至秦末漢初，匈奴崛起，多次打敗月氏，並將月氏趕出原住地。月氏西遷至大夏後，其中的貴霜部落逐漸強大，統一了其他四翕侯，建立了在中亞和南亞歷史上很重要的貴霜王國。貴霜與（大）月氏究竟存在怎樣的關係，月氏人究竟說伊朗語還是吐火羅語（抑或他們原來說的吐火羅語逐漸被大夏語取代），這又是一個難題，涉及內亞和中亞的語言、歷史、民族、地理等諸多背景。

早在 1913 年，列維（Sylvain Lévi）就指出吐火羅語 B 實際上是 7 世紀前後的龜茲語，²這一論斷在以後被越來越多的研究所證實。上世紀 30 年代以來，著名學者如貝利（Harold Bailey）、伯希和（P. Pelliot）、亨寧（W. B. Henning）等都發表論文，對吐火羅語的定名問題進行討論，³從而使得不少疑點得以澄清。多數學者認為吐火羅語 A 可以稱為焉耆語，但根據該語言文書，焉耆人自稱 *Ārsi*（如 *ārši-käntu*，即 *ārši* 語；*ārši-ype*，即 *ārši* 之地），且吐火羅語 A 文獻雖然大多數發現於焉耆（也有一些出土於吐魯番），但從書寫字體考察，在年代分類上屬於較晚階段，並且幾乎沒有用於日常生活的證據。*ārši* 一名的由來及其與焉耆的關係，仍有待

¹ 慶昭蓉《龜茲僧利言的生平事業（上）——兼論唐人所稱「吐火羅言」》，《唐研究》，第 20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487。

² S. Lévi, “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cha,” *Journal Asiatique* II^e série 2 (1913), pp. 311-380.

³ 相關論著數量眾多，不一一列舉。

繼續研究。2013 年，日本學者荻原裕敏從德藏未刊文獻中發現一件吐火羅語 A 世俗文書，其婆羅謎字體與語言特徵可以初步判別為 8 世紀前後。⁴由此可見，吐火羅語 A 並不是僅有宗教用途的殘存語言，而是焉耆的日常用語之一。這樣，焉耆語一名或可成立。

總之，把吐火羅語稱為焉耆——龜茲語，有其依據；至於「吐火羅語」之稱，雖然行用已久，已是「約定俗成」，不過仍有探討餘地。特別是吐火羅語與古代西域的其他語言之間是否存在語言接觸的問題，如與印度——伊朗語、古突厥——回鶻語的相互關係，今後仍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⁵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吐火羅未必能與月氏等同，但兩者的關係仍懸而未決。王國維先生曾考證：月氏即《逸周書·王會》中的「禺氏」、《穆天子傳》中的「禺知」。西方學者也在古典文獻中搜尋相當於「月氏」的記載，提出了各種假設，⁶但至今沒有能夠獲得普遍認同的結論。新疆古代說「吐火羅語」的族群，與吐火羅斯坦的居民截然有別，不能混為一談。不過有跡象表明，居住在新疆的所謂「吐火羅人」、吐火羅斯坦中使用巴克特里亞語（大夏語）的居民、以及中國古代的「月氏」，這三者之間可能是存在著某種聯係的。學者們已經指出，生於龜茲的高僧鳩摩羅什，把

⁴ Ogihare Hirotoishi, "Fragments of secular documents in Tocharian A,"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15 (2014), pp. 103-129.

⁵ 這方面的工作，吐火羅語專家貝明 (M. Peyrot) 正在進行中，可參看：M. Peyrot, "The Sanskrit Udānavarga and the Tocharian B Udānastotra: A windo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and popular language on the northern Silk Roa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9 (2016), pp. 305-327.

⁶ 美國學者白桂思 (Christopher Beckwith) 把「月氏」的古音構擬為 *Tok^war/*Tog^war，從而與「吐火羅」勘同，見其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80-383.

「吐火羅」等同於「小月氏」；敦煌石窟所出 S.367《西天路竟》以月氏指代焉耆等等。⁷

已故加拿大漢學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 1922-2013）對中國民族史和內亞史深有研究，他也傾向於把「月氏」等族群與說吐火羅語的古代諸族相聯係，不過同時指出「月氏」可能是一個混合的族群，語言也非常混雜，其中既有說吐火羅語的成分，也有說伊朗語的成分。⁸蒲立本按照漢代的讀音構擬出對應於「月氏」的吐火羅語詞 *Ywati；與此接近的有見於托勒密《地理志》的一個詞 látioi。鑒於希臘人經營巴克特里亞三百餘年，並且和當地的伊朗語民族融合，希臘羅馬世界當時已經對亞洲腹地有較為明確的認識，這樣的推測似應是能夠成立的。⁹

由於史料中關於月氏及其語言的資料非常貧乏，要在「月氏」起源及其與「吐火羅」的關係這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是極其困難的。30 年來，中國學者如耿世民（1929-2012）、余太山、榮新江、林梅村、王欣諸先生包括筆者都有所討論，限於篇幅，茲不贅述。外國學者如 Craig Benjamin 就月氏的起源與遷徙發表過專著；John Hill 繼何四維和魯惟一之後，對相關漢文史料作了詳細的譯注。¹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3 年 12 月 5 日至 7

⁷ 伯希和（Paul Pelliot），〈吐火羅與庫車語〉，載馮承鈞譯，《吐火羅語考》（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 85-87；黃盛璋，〈「西天路竟」箋證〉，《敦煌學輯刊》，第 2 期（蘭州，1984），頁 5-17。

⁸ E. G. Pulleyblank, "Why Tocharian?"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23, 3-4, 1995, pp. 415-430; "The Peoples of the Steppe Frontier in Early Chinese Sources," *Migracijske*, teme 15, 1-2 (1999), pp. 35-61.

⁹ 萬翔，〈托勒密賽里斯國與鄯道元西域水道地理之對比〉，《中西文化交流學報》（*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第 5 卷第 1 期（美國弗雷蒙特，2013），頁 162-171。

¹⁰ C. Benjamin, *The Yuezhi-Origin, Migration and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 Silk

日，多國學者在柏林舉行關於貴霜歷史的專題討論會，會後由德國學者 Harry Falk 教授編輯專書，將漢語、藏語、梵語、中古波斯語、大夏語、希臘語、拉丁語、亞美尼亞語、敘利亞語、阿拉伯語以至古代巴比倫的原始資料匯集在一起，加以翻譯，譯文之後又加上了多位學者的按語，還選收了部分會議論文（執筆者分別是法國的 Gérard Fussman、Franz Grenet、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英國的 Nicholas Sims-Williams，還有 H. Falk 本人等）。該書已於 2015 年出版，¹¹對於今後的研究工作極有幫助。

通過翻譯家、史學家馮承鈞（1887-1946）先生和後繼者的努力，許多西方著名學者如上文提及的列維、伯希和、貝利、亨寧、蒲立本等關於月氏與吐火羅問題論著的主要內容，已被中國學者知曉。捷克學者 Václav Blažek 與其學生 Michal Schwarz 合撰的關於吐火羅人的近作，¹²筆者也曾作過簡介。¹³不過，捷克著名漢學家霍古達（Gustav Haloun, 1898-1951, 或譯夏倫）發表於 1937 年的名篇〈關於月氏問題〉，¹⁴卻是至今仍未見漢譯本。該文篇幅極長，頭緒紛繁，全文的注釋更是多達 330 餘條，引用多種語言文獻，

Road Studies, 14 (Turnhout: Brepols, 2007); A. F. P. Hulsewé & M. A. N. Lo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C.-A.D. 23* (Leiden: Brill, 1979); John Hill, *Through the Jade Gate-China to Rome.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y CE. New and updated and expanded edition* (Charleston, SC: BookSurge Publishing, 2015).

¹¹ Harry Falk (ed.), *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 (Bremen: Hempen Verlag, 2015).

¹² V. Blažek & M. Schwarz, "Tocharians, Who they were, where they came from and where they lived," *Lingua Posnaniensis*, 50 (2008), pp. 47-74.

¹³ 徐文堪，〈評布拉澤克著，史瓦爾茲編「吐火羅語論集」〉，姚大力主編，《清華元史》，第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457-465。

¹⁴ Gustav Haloun, "Zur Üe-tsi-Frag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91 (1937), pp. 243-318.

用德文寫成，翻譯難度可以想見。

霍古達是一位德裔捷克籍知名的漢學家，曾先後就讀於維也納大學和萊比錫大學，師承萊比錫漢學學派創始人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後在布拉格、哈雷、哥廷根大學任教。1938年離開德國去往英國，就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直至去世。¹⁵

霍古達教授學識淵博，不僅有很深的歷史語言學造詣，而且對有關漢語古籍的音韻、訓詁、校勘、版本目錄等都有比較全面的瞭解，熟悉清儒的考據學和近世中國、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還懂甲骨文和金文，擁有中國邊疆地區和中央歐亞各種語言的知識，以上這些在其論著中都有所反映。

1926年出版的《中國人知道吐火羅人或印歐人始於何時》¹⁶，是霍古達教授一生中公开发表的唯一專著。〈關於月氏問題〉則是在它的基礎上完成的。因為作者對漢語古籍鑽研甚深，徵引所及，連陳介祺的《十鐘山房印舉》都未遺漏。除了廣泛閱讀中、日學者的著作（如當時發表在《禹貢》雜誌上的中文論文）外，作者還特別關注俄文論著，如對漢籍譯文的引用和比較，經常採用俄國漢學家雅金夫·比丘林¹⁷（1777-1853）的譯文，明顯有別於其他西方漢學家。論文中對未西遷而是進入南山與羌人雜居的小月氏的考證極為詳盡，這有助於今天的月氏史研究。

該文最後的結論認為：「月氏」這一名稱的原型可以構擬為

¹⁵ 霍古達對劍橋漢學發展貢獻巨大。朱玉麒先生在劍橋訪學期間，精心搜集資料，對其生平和學術成就有詳細論述，請參看朱玉麒，〈古斯塔夫·哈隆與劍橋漢學〉，《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三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261-310。

¹⁶ Gustav Haloun, *Seit wann Kamten die Chinesen die Tocharer oder Indogermanen überhaupt?* (Leipzig: Verlag der Asia Major, 1926).

¹⁷ 關於比丘林，請參：李偉麗，〈尼·雅·比丘林及其漢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zguĵa, 或*zguĵaka, 即斯基泰人。他還認為見於金文和先秦古籍的「獫狁」, 可能與「辛梅里安人」(Kimmerier, Cimmerians) 有關, 因為「辛梅里安人」經常與「斯基泰」人同時出現。¹⁸

由於時代的局限, 該文利用的考古學文獻較少。近七八十年來, 中國西北地區及國外的內陸歐亞考古發掘有了巨大的進展。以吐火羅人的起源問題來說, 近三十年, 得益於韓康信先生等對新疆地區所發現的人骨進行的系統測量和研究,¹⁹ 學界對新疆古代居民的體質特徵有了新的認識。新疆還發現了大量保存比較完好的古屍, 多出土於南疆和吐魯番、哈密一帶,²⁰ 如著名的小河墓地中的「小河公主」等等。對小河墓地出土遺骸進行了 Y 染色體和綫粒體 DNA 檢測, 分析表明: 東西方基因和文化的融合至少可以上溯至四千年前。基因混合的最初地點, 可能在南西伯利亞, 後來相關人群南遷至塔里木盆地。小河晚期人群的遺傳結構更為複雜, 既有西部歐亞成分, 同時南亞成分和東亞成分也有所增多, 基因多態性增高,²¹ 這應該是小河人群遷入塔里木盆地後, 與周邊人群不斷產生基因交流的結果。

¹⁸ 辛梅里安人在希臘語中作 Kimmerioi, 來源不是很清楚。可能在公元前 9 世紀至 8 世紀時, 斯基泰人的擴張迫使其遷徙。一般推測他們是說伊朗語或色雷斯語的族群, 公元前 8 世紀至 7 世紀居住在高加索以北和黑海地區 (今南俄和烏克蘭), 但對應的考古遺存尚未能確認。霍古達提出的也是一種假設, 雖然之後有學者如奧地利民族學家 Robert von Heine-Geldern 有類似的觀點, 但事實上無從證實。

¹⁹ 譚靖澤、韓康信, 〈中國北方幾個古代民族的體質類型和種族屬性〉, 《現代人類學通訊》, 2007 年第 1 期 (上海, 2007), 頁 58-66。

²⁰ J. P. Mallory & V.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0).

²¹ Chunxiang Li, et al., "Analysis of ancient human mitochondrial DNA from the Xiaohu cemetery: Insights into prehistoric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Tarim Basin, China," *BMC Genet.* 16: 78 (2015).

有的學者認為：原始吐火羅人可以與在公元前三千紀興起於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的阿凡納姜沃（Afanasievo）文化相聯繫，²²屬這一文化的族群在公元前二千紀初左右向南遷徙至塔里木盆地。不過新疆阿勒泰地區發現最早的文化遺存，是距今約 4000 年左右的切木爾切克類型遺址，與阿凡納姜沃文化有明顯的區別。俄羅斯考古學家柯瓦列夫（A. A. Kovalev）曾在蒙古和哈薩克斯坦等地發掘過類似的墓葬，他認為，與切木爾切克文化最為近似的，是法國南部、西班牙、愛爾蘭、瑞士的古代文化，²³切木爾切克文化的居民應被視為「亞洲腹地最早的歐洲人」（Earliest Europeans in the heart of Asia）。

雖然存在不同意見，但總的來說，可以認為：「吐火羅人」是印度——伊朗語居民從帕米爾西面遷入之前史前新疆地區的居民（但並不排斥新疆史前時期還有操其他語言的族群）。這種假設具有相當的可信性，當然也受到了一些質疑，因為同一種語言可以被不同的人群學習和使用，而且史前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和歷史時期的語言及種族隔著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要確認其中的關係是極困難的。因此，還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根據現有的考古綫索，可以認為切木爾切克文化曾經從阿爾泰地區擴張到天山北麓，整個北疆都有切木爾切克文化分佈，在公元前二千紀後半期，在安德羅諾沃（Andronovo）文化深入滲透到烏魯木齊以西地區之前，北疆地區佔據統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切木爾切克文化及其在各地的變體。而「小河文化」等則是切木爾

²² J. P. Mallory, "The Problem of Tocharian Origins: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Sino-Platonic Papers*, 259 (2015), pp. 1-63.

²³ A. A. Kovalev, "The Great Migration of Chemurchek People from France to the Altai in the Early 3rd Millenium B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1:11 (2011), pp. 1-58.

切克文化南下塔里木盆地沙漠、戈壁地區後，適應當地生態環境而形成的新文化。創造切木爾切克文化、古墓溝文化和之後的察吾乎文化的人群，可能和歷史時期留下吐火羅語文獻的人群有一定聯繫，但切木爾切克墓地的情況是十分複雜的，²⁴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根據林梅村、王建新等研究，漢籍中的「祁連山」、「祁連天山」，指現今的東天山。東天山地區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遺址，屬於古代月氏、烏孫、匈奴等早期游牧部族的統治中心。²⁵王建新教授認為，巴里坤東黑溝墓葬群至少有兩大文化區，這兩大區很可能就是月氏和匈奴的家園。一些墓葬中不但發現了牛馬等家畜陪葬，還有用被肢解的人來陪葬的現象。初步推測，這批墓葬的年代是西漢前期，正好匈奴擊敗月氏的時期。巴里坤遺址與月氏可能有聯繫，但不應將其與新疆吐火羅語族群混為一談。從公元前 500 年延續至公元前 200 年的岳公臺—西黑溝遺址可能也是月氏人留下的，到公元前 200 年以後，被屬於匈奴的黑溝梁—東黑溝遺址取代。²⁶

從 2009 年起，王建新先生就月氏考古前往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考察。2013 年 12 月，中國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簽署「西天山西端區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合作協議，展開了合作。雙方在阿姆河以北的蘇

²⁴ 叢德新、賈偉明，〈切木爾切克墓地及其早期遺存的初步分析〉，《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 290-317。

²⁵ 林梅村，〈祁連與昆侖〉，《敦煌研究》，1994 年第 4 期（1994，蘭州），頁 113-116；王建新，〈中國西北草原地區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的新進展—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學探索〉，《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 3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頁 237-253。

²⁶ 趙景龍，〈東天山地區無封堆石結構墓葬初探〉，《考古與文物》，2011 年第 2 期（西安，2011），頁 76-81。

爾漢河周邊的山前地帶，發現了公元前 1 世紀古代游牧文化遺存，這些遺存可能與月氏有關。在 2016 年舉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王先生將這一發現對外公布，並提出經過多年的調查發掘，貴霜帝國是大月氏所建立的這一觀點可能不成立。²⁷正式的報告和論文尚未發表。

經過對考古學資料和遺傳學資料的研究，將可能與吐火羅人有關的小河遺址及察吾乎文化，與可能和月氏有關的巴里坤岳公臺——西黑溝遺址相對比，兩者的文化內涵和 DNA 檢測結果都明顯不同，無法在月氏和吐火羅之間劃等號。²⁸關於吐火羅與月氏關係問題的最終解決，仍有待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分子人類學和語言學等諸學科的進一步綜合研究。

將霍古達教授的遺作連同全部注釋都譯為中文，是一項異常困難的工作，艾立德先生譯成後又反復斟酌，陳健文教授仔細校閱，均倍極艱辛。筆者祇是將譯文拜讀一過，稍作修改，並補充一些近年來的新進展，聊供參考，其中肯定還有未盡完善之處，敬希讀者提出寶貴意見，是所至感。

2016 年 12 月 20 日於上海

²⁷ 趙建蘭等，〈考古調查揭開大月氏的神秘面紗〉，《中國文化報》（北京），2016 年 11 月 3 日。

²⁸ Wei Lanhai, Li Hui and Xu Wenkan, "The separate origins of the Tocharians and the Yuezhi: Results from recent advances in archaeology and genetics," M. Malzahn, M. Peyrot, H. Fellner and Theresa-susanna Illés (eds.) *Tocharian Texts in Contex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charian Manuscripts and Silk Road Culture, June 25-29th, 2013* (Bremen: Hempfen Verlag, 2015), pp. 277-299.

補記

一、郭物先生指出：石雕人面像在中國東部地區的史前文化中很罕見，而在歐亞草原西部則源遠流長，從黑海北岸地區、南西伯利亞，到安納托利亞、意大利等地均有發現。阿凡納羨沃文化與歐亞草原西部文化關係密切，但沒有發現石雕人面像。南西伯利亞和中國新疆使用石雕人面像大約是從公元前 2500 年左右的奧庫涅沃（Okunev）文化和切木爾切克文化（約公元前 2500 年—前 1500 年）開始的。值得注意的是，陝北石茆遺址也發現了石人像。因此，石人像成為解讀黃河流域與歐亞草原文化關係的綫索。引自《石茆石人像佐證文化交往》，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 年 1 月 22 日。

二、法國學者 Franz Grenet 認為：公元 1 世紀至 3 世紀的貴霜帝國存在游牧文化的因素，²⁹這可能與大月氏西遷的影響有關。根據分子人類學研究，新疆假設的「吐火羅人」，其 Y 染色體主要為 R1a1-M17 和 R16；斯基泰人 R1b 少，主要是 R1a1，與印度伊朗人比較接近。「斯基泰」是歐亞大陸各游牧族群的通稱（從頓河與多瑙河之間、黑海以北直至內蒙和鄂爾多斯），其語言可能主要屬東伊朗語，但并不排除其中有說其他語言的成分。因此，霍古達把「月氏」與斯基泰相聯係，這種看法至今仍不能看做完全過時。

三、關於大月氏和大夏及貴霜三者的關係，請參看楊巨平先生的新作 “Dayuezhi, Daxia, Guishuang, and Dumi in Chinese Sources,” *The Silk Road* 14, 2016 (2017), pp. 97-105.

²⁹ F. Grenet, “The Nomadic Element in the Kushan Empire (1st-3rd Century AD),”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3 (October, 2012), pp. 1-22.

